

商代遗珍



Legacy of Shang Dynasty

Cultural Relic Highlights from Dayangzhou, Xin'g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

深圳博物馆 · 江西省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深圳博物馆
SHENZHEN MUSEUM

ISBN 978-7-5010-2940-2



9 787501 029402 >

定价:150.00元

图录编辑

主 编: 叶 杨 彭明瀚
副 主 编: 郭学雷
编 委: 李龙章 王 宁 李维学 周雄伟
黄阳兴 蔡 明 乔文杰

图录摄影: 严钟义

文字撰写: 王 宁

校 对: 蔡 明 乔文杰

英文译校: 刘 琨 蔡晓明 黄宗晔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编辑: 张广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代遗珍: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 / 深圳博物馆, 江西省博物馆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10-2940-2

I. ①商… II. ①深… ②江… III. ①商墓—出土文物—新干县—图录 IV. ①K873.5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3995号

商代遗珍——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

编 者: 深圳博物馆 江西省博物馆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215×285 毫米 1/16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2940-2
定 价: 150.00 元



Legacy of Shang Dynasty

商代遗珍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

Cultural Relic Highlights from Dayangzhou, Xin'g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文物出版社

前言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共出土文物1300余件，主要是铜器、玉器和陶器。475件青铜器铸造精美，特色鲜明，堪称中国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新干出土的青铜器，有些大型器物是先分铸部件然后再合铸而成的，显示出高超的铸造技术。新干大洋洲还出土了754件玉器和139件陶器。玉器中有礼器、仪仗器及装饰品等，陶器中有20%的釉陶和原始瓷器。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20世纪70年代初期赣江中游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的发现，撩开了“南蛮之地”历史的神秘面纱，而1989年距吴城遗址20公里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代大墓的发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赣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认识，而且对南方历史和整个商代文明都提出了种种发人深思的新问题。该遗存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且还评为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Foreword

In 1989 more than 1300 pieces of historical relics had been unearthed in a Shang Dynasty mausoleum in Dayangzhou, Xin'g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which are mainly inclusive of bronze, jade and pottery. The 475 delicately-founded bronzes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bronze. Some large wares are assembled with caste parts, showing excellent casting technique. The historical relics also include the 754 pieces of jade and 139 pieces of pottery. There are jade scepter, ornaments and 20% potteries are glazed or proto-porcelain.

Highlight of the Dayangzhou mausoleum is the bronze, because this is the largest Shang-dynasty bronze site among all the sites discovered so far in China. It is a key breakthrough after Ruins of Yin (Yinxu, Henan province) and Sanxingdui (Sichuan province). The Shang Dynasty site in Wucheng, Zhangshu city had already altered the so-called "southern barbarian land" mindset. And this site namely Dayangzhou 20 kilometers away from Wucheng further overthrew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about southern China in ancient ti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raised questions to rethink and recognize Shang Dynasty. This site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top ten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listed as one of the 100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20th century.

致 辞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我们与江西省博物馆联合举办“商代遗珍——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既是向特区3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为市民精心策划的一次商代江南“文明之旅”。

江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人杰地灵，文物资源丰富。1989年，新干大洋洲发现震惊世界的大型商代遗存，揭开了一座3000多年前艺术宝库的神秘面纱，其中出土的400多件铸工精湛且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及大量精美的玉器和原始瓷器等，充分证实了赣江流域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璀璨多姿的“青铜文明”。大洋洲遗存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商代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体现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赣江流域文明的有机融合，由此揭开了探索中国南方古代青铜文明的新篇章，并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此次展出的大洋洲文物精品主要包括青铜器、玉器和陶瓷三大类，共125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0件（组），尤其是青铜器数量众多，品类齐全，造型奇特，铸工精巧，纹饰华美，代表了商代南方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令人叹为观止，如神情诡异的双面神人铜像、构思精妙的提梁方腹青铜卣、气魄雄伟的鹿耳四足甗、浑厚威严的嵌红铜云纹青铜钺等，都堪称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杰作。巧合的是，今年是虎年，虎纹又是大洋洲青铜器装饰艺术最为突出的地域特色，这也许是深圳与大洋洲文化的一份殊缘。

最后，谨向鼎力支持此次展览的江西省博物馆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本次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深圳博物馆馆长 叶杨

致 辞

江西素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曾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发祥地，中华文化昌盛发达的省份之一。文物资源特色鲜明，革命文物、陶瓷文物、青铜文物、宗教文物、客家文物、书院文物和历史名人文物均是赣地文明的精髓，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传承文明、加大文化交流的力度，是文物工作者承担的时代责任和使命。

“十一五”期间，我馆实施“展览活馆”战略，请进来，走出去，着力办好馆内基本陈列、专题展览和出国、出省巡回展览三个层次的展览，以馆藏文物为载体，突出地方特色，集中优势文化资源，同时精心组织，精心设计，推出精品展览，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和兄弟省、市的文化交流，将展览影响面拓展到省外、国外，将江西省的文博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江西瑞昌铜岭古矿遗址、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墓是20世纪江西先秦考古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吴城遗址的发掘，确立了江西商代考古的时代标尺，瑞昌铜岭古矿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掘，揭开了江南商代文明的新篇章，尤其是大洋洲商墓，因其内容的丰富和精美而震惊中外，其中青铜器的出土最为引人注目，堪称中国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该遗存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列入“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正是由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出土，使得商时期中国青铜文明呈现出河南安阳、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大洋洲三足鼎立的格局。自1989年发掘以来，大洋洲珍宝中的部分文物足迹遍及美国、日本、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饮誉海内外；还赴上海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知名博物馆展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在文化建设和改革中探索出了新路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绩，尤其是在博物馆事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江西省博物馆能与深圳博物馆联合举办文物展览，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相信，这次交流活动一定能为双方今后进一步的合作打下牢固基础。此次展览，得到了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和深圳博物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大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艰辛的劳动，借此机会，我代表江西省博物馆全体同仁，向为此次展览给予关心和支持的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和深圳博物馆致以谢忱！

预祝本次展览圆满成功！

江西省博物馆馆长 彭明瀚

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与研究

彭明瀚

江西商代考古起步比较晚。江西商代文化遗存的发现，是以20世纪70年代初樟树吴城遗址的发现为开端的，较之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现，晚了大半个世纪。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973年发掘吴城遗址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江西各地发现了属于吴城文化的遗址200多处，其中有3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即樟树吴城遗址、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1]和新干大洋洲商墓^[2]的发现与发掘。吴城遗址的发掘，确立了江西商代考古的时代标尺，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掘，揭开了江南商代文明的新篇章。可以说，这一系列考古大发现，使江西早期文明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 商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1989年9月20日，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青铜器，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共出土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其中，青铜器包括容器10种48件、乐器2种4件、兵器11种232件、手工工具7种92件和农具11种51件。这是江西，也是江南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数量最多、器种最丰富的一次，铸工精细，特色鲜明，是南方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在商代，同一埋藏单位内出土如此之多的铜器、玉器，只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殷墟妇好墓可以与之相比。陶器的数量则更是罕见。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国家文物局给江西省文物局发来贺电，称“这是我国近年来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江西文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3]。1990年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南昌召开大洋洲考古大发现新闻发布会，指出：“新干商代大墓铜器群的空前发现，不仅是中国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而且将为我国青铜文化研究揭开新的篇章。它所提出的种种发人深思的新问题和揭示的奥秘，必将给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乃至整个中



考古人员在清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随葬玉器

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4]

吴城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与年代(分期)等方面提供的证据，为江南商代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一项很重要的成果。但吴城出土青铜器太少，还不足以反映当地青铜文化的面貌、特征和发展规律及其与周边各区系青铜文化间的关系。所以江西的考古工作者企盼在这里有新的突破性发现，距吴城20公里外的赣江东岸大洋洲青铜器的出土，正好弥补了上述不足，为深入研究有关学术课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大洋洲器物群包涵了中原商文化、西北先周文化以及江南土著文化、良渚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表明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了自己的固有文化传统，同时也吸收了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是商代文化的一个部分，在某些方面填补了商代文明的空白，丰富了人们对商代青铜文化的认识。因而，大洋洲商墓是20世纪一项突破性的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远比吴城遗址的发现要多得多的注意。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一个“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政治中心，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远在长江以南的赣江中游地区的新干大洋洲，存在如此富有鲜明地方特色而又可以与中原殷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不能不使人们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李学勤先生认为：“新干商墓的重要性在于以往大家为传统观念所束缚，把古代的南方设想为蛮荒落后。近年一系列考古发现，逐渐揭开了事实的真相，使南方的古文明史重现其应有的光辉。商代吴城文化分布的赣中、赣西北是具有相当高文化水准的地区，与中原王朝有密切的文化交通关系，这不但改变了我们对这一地区古文明的理解，也把南方以至整个商代文明的图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5]殷玮璋先生考察大洋洲出土青铜器后指出：“如果说前几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祭祀坑及其大批青铜器曾使学术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去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商墓及其大批青铜器，同样会使学术界的同仁们惊叹不已。因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这两批青铜器具，使人们对江南地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出土现状



商文化及其影响区域内重要青铜遗存分布示意图

区青铜文化的面貌及其发展水平有了全新的认识。新干大洋洲的这一发现不仅对江西的考古工作，而且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吴城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与年代(分期)等方面提供的证据，为在这一地区开展商周考古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是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可惜吴城出土的青铜器毕竟太少了，它的出土物还不能完全回答上述问题。所以人们企盼在这里有新的突破性成果。这次在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铜器群恰恰弥补了上述不足，为深入研究有关学术课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干商墓的确是一个突破性的重大发现。”^[6]安金槐先生认为：“新干出土了众多商代青铜器，揭开了江南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它是我国考古学中一项重大发现，对于商代考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至喜先生认为：“新干商墓中又出土四百多件青铜器，更为解决南方青铜器的产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物证。虽然在这些铜器中，器形和纹饰有的与中原商代铜器风格相同或相似，说明其与中原商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所受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也

不乏有地方特点的器物和首次发现的青铜器，如立耳上饰圆雕老虎的扁足鼎、巨型甗、虎尊、假腹豆、云纹尾部上翘的铙、刮刀、两翼刃一长一短的镞、犁头等等，均是只见于江南地区或是首次出土的商时期的铜器，因而说明这些铜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应是在当地铸造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铜器出于同一墓葬，它们有共存关系，对于研究这些青铜器的年代、组合、用途、器形和纹饰的地方特点，乃至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也雄辩地证明江南地区当时已有非常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其冶铸技术和工艺已十分高超，某些铜器的铸造水平，并不比当时中原地区逊色。”^[7]

二 大洋洲商墓的性质

1989年大洋洲商墓发现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的问题已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但仍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比如遗存的性质问题、文化属性问题、年代问题等。

关于遗存的性质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墓葬说，另一种主张祭祀说。

墓葬说：发掘的参加者基本上主张墓葬说，发掘报告和简报均采用墓葬说，发掘的参加者在此后的各类著述中基本上采用墓葬说来表述该遗存的性质^[8]。

祭祀说：祭祀说大致可以分为巫沙祭祀说、沉浮祭祀说和社祀说三类。吴之邨先生倡导巫沙祭祀说。他旁征博引，列举了大量文献和实例来证明历史上曾有过“巫沙”祭丘和“浮沉”之祭的情况，认为大洋洲是“殷商之际盛行的以女巫瘞祷水旱的‘巫沙’祭丘遗存”^[9]。

唐嘉弘先生倡导沉浮祭祀说。他指出：全面的考察，新干大洋洲商墓当系这里的方国“君王”在河川上固定祀地进行“浮沉”之祭时的祭品，延续时间有数十年之久，甚至更长一些^[10]。李家浩先生认为，大洋洲器物群是历年来在赣江之滨祭祀水神之后，分批埋入沙丘之中，因而各种器物不可能有规律地分布、同处在一个平面之上。“遗存的性

商代遗珍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

14

质，只能是祭祀坑，而不是墓葬”^[11]。

笔者倡导社祀说。笔者从遗存的形制特征、所处地理位置和出土器物构成三个方面来否定“墓葬说”。大洋洲遗存位于赣江边，与古代南方居民择高而葬的习俗不相合；该遗存上有高达5~6米的封土堆，与商代没有产生坟丘的事实不相符；出土物分布没有规律，品种也比较单一，时代跨度大，体现不出商代应有的礼制，这些现象与我们在殷墟所发掘的高级贵族墓情况不同，如果把它作为祭祀坑来看待，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认为大洋洲器物群是吴城文化先民立社时举行重大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典礼性器物，该遗存是一处社祀遗存^[12]。

三 大洋洲商墓的年代

由于大洋洲商墓出土物种类较多，内涵丰富，既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又有先周文化因素以及土著吴城文化因素；有的青铜器具有较早的商代中期特征，有的却明显属于晚商时期，有的甚至类似于西周早期的器物，因而使一些学者对该遗存的年代产生较大分歧。关于大洋洲商墓的年代，目前主要有以下七种看法：

二里冈上层说：安金槐先生认为大洋洲的青铜器有许多器形和花纹特征，“基本上和河南郑州商代二里冈上层的同类青铜器相类同”，“这说明两地出土的这些相类同的青铜器时代是相近的”，其时代属商代中期^[13]。

殷墟一期说：孙华先生认为大洋洲的青铜器有早晚之别，最早的为二里冈上层，但最晚的青铜器为殷墟一期，因而大洋洲商墓的年代“应当在殷墟一期，它在商代大型铜器墓分期序列中应在殷墟妇好墓之前，而不是与之相当，应是殷墟一期偏晚的一座大墓”，“可能相当于殷墟早期，稍早于妇好墓”^[14]。

殷墟早、中期说：该遗存的发掘者彭适凡先生等认为，大洋洲最早的青铜器为二里冈上层，最晚的相当于殷墟早、中期，并结合陶器断定该墓“下葬年代应在商代后期早段，大体相当于殷墟早、中期”^[15]。